

·哲学研究·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乐 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研究室,北京 100732)

摘 要: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关键词: 天主教;中国;文化

中图分类号: B9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6)05-0015-06

一 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

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3世纪的元朝就已传入中国。1289年,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意大利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作为使节乘船来华。他于1294年到达中国元朝的京城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朝皇帝铁木尔的友好接见,被允许在华传播天主教。经元朝皇帝同意,1298至1318年孟德高维诺传教士在大都先后建造了三座天主教堂。由于受到元朝皇帝的宽容,西方天主教迅速传播到中国福建泉州、浙江杭州、江苏扬州、陕西西安、甘肃、宁夏、内蒙古五原、新疆伊犁等地,并在这些地方都建有教堂,发展教徒达数万人之多。当时,天主教徒也称“也里可温”,蒙古语原意是“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暂时中断。

16世纪,随着欧亚航路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方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最初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建立传教点,其他西方国家天主教传教士也相继来华建立教会。1582年(明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华传教,起初在广东省肇庆县活动。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他来到北京,一方面向明朝皇帝呈献自鸣钟、三棱镜等物,另一方面以传播西

方科学知识为媒介,以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文化习俗相结合为传教方针,得到明朝当局和士大夫们的赞赏。继利玛窦后,天主教其他修会也相继来华传教。至明末,西方天主教会在华已发展了约15万教徒。

17世纪,清初,西方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继承了利玛窦的传教方针,使天主教在中国有较大发展,教徒人数发展到30万人。后因罗马教廷下令不准中国教徒举行中国传统礼仪(敬拜祖先和祭祀孔子),遂发生了“中国礼仪之争”,导致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的对抗,使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清朝皇帝下令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使教徒人数迅速降至20万人。

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二说:一是从孟德高维诺来华传教之时,即1294年算起;二是从利玛窦来华传教之时,即1582年算起。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门户,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深入中国内地,建立教堂,设立教区,发展教会力量。至19世纪末,天主教徒已发展到70多万人。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天主教受到打击,教徒人数锐减。

收稿日期:2006-03-10

作者简介:乐 峰(1928-),男,山西洪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教授,主要从事基督教研究。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动荡的年代,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西方天主教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变革,相应地改变了传教方针和方法,积极在华兴办教育和慈善事业,扩大社会影响。至1921年,天主教在中国发展教徒已达200多万。

国民党统治时期,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更快,截止1949年,天主教徒人数已增至300多万。^[1]当时罗马教廷将中国天主教划分为20个教省,100多个教区,教省主教和教区主教多由西方传教士担任,掌握一切大权。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先后成立了三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文化大革命”中,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破坏,天主教会受到迫害,教徒人数急剧下降。自改革开放以来,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国天主教走上了正常道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天主教有112个教区、61位主教、1000多名神甫、1000多名修女,近400万教徒。

二 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

(一)西方天主教适应中国民俗的传教方式

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后,为了能够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传教,对中国国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们决定改变传教方式,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这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了使天主教在中国人中间不致引起怀疑和误会,传教士们开始在群众中出现时,并不公开谈论传教之事。他们一方面深入中国城乡,广泛接触群众,了解中国实情(中国的历史、地理、物产、土地、风土人情、官府情况等),另一方面用大量时间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书法、绘画等。与此同时,他们为了便于与中国老百姓接触,打成一片,专门研究了中国的服饰,在装扮上也尽量中国化,于是他们穿上了中国传统的服装——儒服。不仅如此,为了使传教工作顺利进行,他们研究了中国三种不同的宗教(佛教、道教、儒教),其中深入地研讨了中国最为盛行的儒教,同时了解了中国人对宗教的看法和宗教在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剖析了中国人的宗教心态。实践表明,利玛窦等人在华期间,懂得了若要使天主教盛行中国大地,首先要使天主教教义与中国的孔孟之道和敬祖思想相结合,宣称中国古书上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

崇拜的“天主”。这样,可以适合中国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之胃口。

(二)西方天主教教义与儒学之比较

这里要探讨的是两种思想能否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天主教出现在古代西欧,而儒学则产生于古代中国。这两种学说都是在封建社会里发展和巩固起来的,都是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它们的宗教道德方面来看,这两种学说都有诸多结合在一起相同点,即存在着天主教教义儒学化的因素。它们的共同点是:

其一,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都相信一神论。天主教的一神(天主)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对“天”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对“天”的观念中,虽有多神崇拜倾向,但在多神之中确有一个至高至尊的昊天上帝,这与天主教所信仰的天主,同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神),并无任何区别。这只要看一看中国人怎样解释“天”字就清楚了,例如《说文解字》一书指出:“天,颠也”。这句话含有至高无上的意思;又如《诗经》里有不少“上帝临汝”、“赫赫上帝”等句子,可以证明古代中国人具有以“天”为主宰的信仰;再如墨子的《天志篇》一文里描写的“天”不单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主宰,而且也是一个爱人利人的父亲。

其二,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都主张“仁爱”。天主教号召信徒要爱天国中的天主,爱尘世中的耶稣,要把“仁爱”建立在天堂和尘世生活的基础上;教导信徒要有爱心,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甚至要爱仇敌,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天主教经典又指出:如果没有爱,即使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仍然与己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上述道理,在中国儒学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观点,例如,孔子主张的“唯仁”的道德中,就有“仁者爱人”的观点;又如孟子主张“德治”和“行仁政”,肯定人性生来是善的,都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道德意识;再如孔孟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准则就如同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世人而牺牲在十字架上一样。

其三,天主教教义和儒学都重视精神道德修养问题。天主教告诫信徒要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生活。天主教经典指出:“人若得着全世界,失去了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活着不是单靠吃饼,而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由此可见,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至于说到改造自我,天主教认为,首先是悔改,向神甫忏悔自己的过

错,重新做人,达到一个符合宗教道德的完人。在中国,儒学注重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视富贵如浮云,求精神之逸乐,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文人志士的人生观。儒学倡导人们应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非功利态度,可以说是中国数千年来人们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再如儒学主张的“反身而诚,慎独克己”等于天主教的弥撒、忏悔。总之,中国儒学在道德上的主张,并不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而是利人的大公无私。^[2,3]

三 利玛窦实现天主教教义儒学化

为了使天主教教义儒学化,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采取了以下做法:

第一,研究中国文化,主张天主教教义吸收儒家学说。利氏来中国后,花了十年时光,专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阅读中国古籍经典。他不仅能写出一笔漂亮的中国汉字,而且能模仿中国下层社会的谈吐,熟悉中国社会的各种风俗礼节,了解中国人的各种宗教信仰,对儒家的敬祖祭天能兼容并包,并且也能尊崇儒家学说,所以得到朝廷的宽遇和士大夫的欢迎。

第二,广泛结识中国朝野知名人士。利氏初到广东肇庆时,便结交地方官吏和儒士,并赠给他们以地图、地球仪、浑天仪、日晷、报时器等物,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不久,他去广东韶州,结识瞿太素,从瞿太素研读四书、五经,作拉丁文释义和注解;又向瞿传授西学(数学、几何、力学等)。受瞿的劝告,他知道了在中国和尚地位低下,因而改僧服为儒服,蓄发留须,改称“西儒”。后来,他到江西南昌认识官吏王忠铭、祝石林等人以及名儒李心齐、李卓吾等人。据历史记载,当时他结识的官吏和名士,不下百人。再后,他到达南京,与达官名人相交往,介绍西方科学知识,并结识进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在他的影响下,这些人也先后入了天主教。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随官吏王忠铭进北京,欲向皇帝面呈贡礼,结果没有成功。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氏再次来京,向明神宗进贡,呈上自鸣钟、万国图志、天主和圣母图像、天主经、珍珠镶十字架等物,从而获准定居北京传教,结识不少朝廷达官显贵和儒士。

第三,介绍西方文化,启发中国人的闭塞思想。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世界之大和科学之名,经介绍世界地图、自鸣钟等物后,才使人们惊叹不已。自从利玛窦把西方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来,才使中国在地

理、数学、天文学等学术方面打开了新局面。他的译著《天学初函》、《天主实义》、《几何原本》,对当时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基于上述原因,中国信仰天主教的人数日益增多,最初只有信徒不足20人,但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经他施洗的天主教信徒已达25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不少信徒是朝廷内地位很高的达官贵人和鸿儒硕学,如李之藻、瞿汝夔、徐光启等人。

四 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天主教传教士

(一)天主教传教士把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有如下方面

1. 介绍西方天文学。在明清两朝之际200多年中,天主教传教士们以西方天文历法修正中国古老天文学的错误,翻译、编纂了多种天文历法书,制造了天体仪、地球仪、计时日晷、望远镜等观测仪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些懂得测量方法的天文学工作者。

2. 传播西方数学。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等人精通数学,把西方数学理论传入中国。他们翻译了三角学、几何学、代数学、对数表等,培养了一些著名的数学家,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对中国数学理论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4]

3. 输入西方地理学和以新法测绘地图。利玛窦来中国后矫正了中国人关于天圆说的错误观念,提出地圆说的正确观点。利玛窦所著《山海舆地全图》提出地理学的新观点:地球呈圆形,有南北二极和赤道,有360度,有经、纬线;气候分为五带;陆地分为五大洲等。中国人从此知道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清康熙皇帝执政时,请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他们用三角测量法,辅以天文仪器观测。此项工作历时27年才完成。康熙对《皇舆全览图》之完成极为满意,并大加赞赏。

4. 介绍西方物理学。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不但精通数学,也精通物理学。他在明朝“西洋历局”任职时,曾著《远镜图说》一书,该书是欧洲光学传入中国之始,描述了望远镜的制法及其原理,如凸镜凹镜配合、光线曲折反射等原理。之后,是传教士德国人邓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与中国人王徽共同翻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一书。介绍了物理学原理,指出“天地生物,有数、有度、有重。数为算法,度为测量,重即力艺,三者皆相资而成。”比如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原理,都属于物理学中的力学。该书对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5. 传播水利学知识。天主教传教士熊三拔(Sabbino deursis, 1575 - 1620)将西方水利学首次传入中国。他撰写的《泰西水法》就是一部有名的水利学专著,书中谈到取水、蓄水之法,专论水性等问题,这对发展中国农业水利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6. 制造枪炮术。明末,中国枪炮的制造已经落后,不如西方精良。西方枪炮术传入中国始于葡萄牙人东侵。天主教传教士入中国后,中国科学家徐光启从利玛窦学火器,而知其术,成为精于西方枪炮制造术的第一位中国人。之后,多名传教士来华传授枪炮制造之术。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汤若望著书《火项挈要》,并讲授放銃法、火器使用法,编纂火药城守等书,铸钢炮几位。现在故宫内放置的生铁大炮就是在汤若望主持下制造的。在清朝,1860年(康熙皇帝十九年)南怀仁著书《神威图说》,详载炮火铸造之术,并铸造战炮300多位。

7. 制造精密仪器。明末清初之际,西方天主教传教士除了初来中国时自带一些自鸣钟、八音琴、三棱镜外,后来还制造了一批精密仪器,如天文仪器、望远镜、显微镜、钟表、机器人等物。

8. 介绍西方医药学。西方医药学于明末传入中国,首先传入的是解剖学。传教士德国人邓玉函、意大利人龙华民(Nicololongobardi, 1559 - 1654)合译的《人身图说》,即今日的解剖学。清康熙年间,西方医术继续传入中国。康熙皇帝喜欢西方医术,聘请西方医生供职于皇宫中,为其做过外科手术,并以西药奎宁治愈了他的疟疾,这些都是西方医药学传入中国的证明。

9. 介绍西方音乐学。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始于葡萄牙传教士定居澳门之时。当时传教士们在澳门建造了教堂。为了做弥撒、歌诗颂神、用琴和韵,他们在教堂内设置了“风乐”(即风琴)。此后,西方音乐和乐器不断地传入中国内地。明末,利玛窦进京朝觐时,向皇帝献铁弦琴一把。神宗皇帝爱之,命内臣学习。至清康熙年间,西方音乐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传播。传教士们多次用西方乐器为康熙皇帝演奏。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昇(Thomas Pereira, 1645 - 1708)精通音乐,著有乐理《律吕新书》,论述音乐谱和、曲调编排(即五线谱的制作和用法)。传教士德理格(Redrini, 1671 - 1746)在清宫廷中任音乐教师,专为皇太子们讲授乐理,教他们按谱歌唱弹奏等。

10. 介绍西方绘画艺术。明清期间,西方绘画艺术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带入中国的。首先是传教士意

大利人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 - 1607)于1579年(明万历七年)来华时将耶稣及其圣母玛利亚画像带到中国。其后利玛窦在中国南方各地传教时,建造了一些具有宗教艺术风格的天主教堂。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利氏进京朝觐时,又携有天主和圣母图像(即艺术品),向皇帝进贡。继利氏后,传教士汤若望也把宗教图画呈献于清皇帝,其中有彩绘天主降凡一生事迹各图、用彩色蜡制成的三王来朝天主圣像一座。至清朝时,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 - 1766)来华传教,不久进京,任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宫廷画师,绘有《百骏图》等画,颇受皇帝们的喜爱和赏识。上述西方绘画艺术传入中国后,使中国绘画艺术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了中国画家,例如明朝画家董其昌的绘画曾受西方影响,吸收了西方风格;又如清朝画家吴历,不但仿效了西方绘画法,而且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法,创造出新的中西结合的绘画法。^[4]

11. 介绍西方建筑艺术。在建筑方面,中国建筑也受到西式建筑艺术的影响,有许多欧化的特点。明末时,葡萄牙人居澳门,意大利人入广州,耶稣会士到北京,他们在这三地所建的房屋为西式建筑艺术。西式建筑的崇楼仙阁、高檐飞栋,颇为中国人喜爱。在西式建筑中,以圆明园的西洋楼最负盛名,设计师是供职于清宫廷内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Michael Benoist, 1715 - 1774)。传教士法国人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 1702 - 1768)称圆明园建筑为“万园之园”。

12. 办教育,建学校。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办教育和建学校,把西方的教育制度输入中国,使中国的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利用庚子赔款,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培养了大批学生,对中国教育做出了一定贡献。据统计,天主教会在华开办的大学、中、小学校,到1914年共有8千多所,学生总数共有1万3千多人。比较有名的大学有:美国天主教会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大学”,1922年在天津创办的“工商学院”,1925年在北平创办的“辅仁大学”。

13. 传播西方哲学。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始于明末,首先由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 1566 - 1640)把西方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他的著作《斐录汇答》(“斐录”是西语哲学的译音)主要讲述了希腊哲学思想——宇宙四大元素:火、气、水和木。这部著作对古代中国哲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之后,有天主教传教士葡萄牙人傅汛际

(P. Franciscus Furtado, 1587 - 1653)与李之藻合译《名理探》一书,将西方逻辑学(主要讲归纳法和演绎法)传入中国,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二)天主教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世界,有如下几点

1. 介绍中国语言文字。西方传教士为了在中国传教,了解中国,必须要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他们编纂中西字典时,在汉字旁附以罗马字母拼音和注以西文解释。这种中西字典传入西方后即发生了影响,使西方人开始对中文有所了解和认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 - 1628)所著《西儒耳目资》便是沟通中西文字的一部杰作,是一部帮助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西文字注音字典,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汉字拼音化都有一定贡献。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4 - 1692)被人称之为西来“孔子”。他回欧洲后,曾教授德国人学习中国语言,著有《拉丁汉文小辞典》、《汉语初步》等书,是较早把中国文字传入西方的人之一。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 M. de Premare, 1666 - 1735)著的《汉语札记》是一部有影响的语言学著作,论述了中国语言的性质和构造,是西方学者介绍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其中有1万2千条汉文字例句。清初,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 1730)通晓中国风土人情,著有《中法辞典》、《易经总旨》等书,并将其传入欧洲。清乾隆时,法国传教士钱德明(J. J. M. Amiot, 1718 - 1793)擅长研究满文和汉语,著有《满法辞典》、《满语文典》等,这些辞典在法国巴黎图书馆均可见到。

由上可见,西方传教士来华学习、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原本为自己学习之用,但其影响已超出传教士自身,远及西方世界,开创了西方研究汉学之风。这也是传教士们的一大功绩。

2. 西传中国经籍。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之后开始研究中国的经书。利玛窦是最早研究中国古书的人。他把中国的《尚书》译成西文,使西方人才知中国经书之真谛。在他之后,不少传教士翻译过中国的《四书》和《五经》,如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orcetta, 1625 - 1696)用拉丁文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孔子传》等;又如马若瑟、白晋和法国传教士傅圣泽(J. F. Foucquet, 1660 - 1740)用法文共同翻译了《易经》、《春秋》、《老子》、《淮南子》等。白晋将《易经》介绍到欧洲,引起了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的极大兴趣。^[5]一些西方哲学家认为中国人所信奉的是

“自然宗教”,而不同于西方的“超自然宗教”。因而中国哲学成为18世纪西欧唯物论者和无神论者的思想武器。此外,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亦受到影响。

由上可见,经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一切文物古迹、风俗民情无不蕴藏其中,要想知道中国真情,不能不读中国经籍。而西方传教士的贡献就在于使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使欧洲人民能认识中国,从而引起他们的崇敬。

3. 介绍中国历史。中国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历史。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五千年灿烂光辉的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来华后,除了传教外,还花很大精力潜心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著名传教士有:意大利人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 1614 - 1661),著有《中国史稿》和《鞑靼战记》;法国人冯秉正(J. M. A. de Mailla, 1669 - 1748),著有《中国历史》和《中国通史》(共13卷);葡萄牙人曾德昭(Alv. De Smedo, 1585 - 1658),著有《中华帝国志》;法国人金尼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4册);比利时人柏应理,著有《中国史年表》;法国人张诚(J. Fr. Gerbillon, 1654 - 1707),著有《鞑靼记行》;法国人白晋,著有《康熙帝传》和《中国现状论》;法国人钱德明,著有《乾隆御制盛京赋》、《中国兵法考》、《中国古今音乐记》、《孔子传》等;法国人李明(Louis de Comte, 1655 - 1728),著有《中国现状新志》。上述著作在西方世界颇有影响,极为盛行,深受欢迎,引起西方人的注意和广泛兴趣,对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4. 介绍中国舆地。中国舆地之学,也引起了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极大兴趣。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最先把中国地图传入欧洲。他绘制的地图叫做《中国新地图》(Norus Atlas Sinensis),共有17图,附有171张地图说明。该地图的底本采用的是明朝陆应阳所绘制的《广舆论》。该地图于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开出版,引起欧洲人的重视和兴趣,一时间销售一空。随后,西欧各国争相翻印。该地图是当时西方世界了解和研究中国舆地最好的著述。

清康熙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雷孝思(Jean - B Regis, 1663 - 1738)等人所测量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蒋友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在法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享有很高的荣誉,令西方人十分钦佩。

5. 翻译中国戏剧文学。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不但对中国经籍很重视,而且对中国古典戏剧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若瑟曾将元

曲《赵氏孤儿》译成法文。《赵氏孤儿》的翻译出版在西欧引起巨大的反响。法国作家、哲学家伏尔泰根据这个译本改写出《中国孤儿》剧本,并公开上演,在欧洲引起轰动;又如意大利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 - 1902),著有拉丁文《中国文学课程》,其中载有《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好逑传》、《西厢记》等内容;再如,法国来华天主教传教士戴遂良(Leon Wieger, 1856 - 1933)在华传教30年,同时翻译了许多中国的著作,其中包括《聊斋》、《搜神记》、《两世姻缘》等内容。^[5]

综上所述,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为了能在中国顺利传教,除了设法把天主教教义儒学化外,还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西学东渐”方面,他们多领域地把西方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介绍到中国来,这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国逐渐走向进步,这应该说是他们的贡献;在“东学西渐”方面,他们多方面地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使西方人了解和认识到中国历史之悠久、辉

煌和文化之灿烂,使他们耳目一新,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伟大,这也是传教士们的一大功绩。由此可见,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们在华传教过程中也有负面影响,但他们中间多数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敬慕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西渐,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并传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参考文献:

- [1] 张小青. 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部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2] 张 力. 中国教案史[M]. 成都: 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3] 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4.
- [4] 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 [5] 任延黎. 中国天主教基本知识[M].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Culture

YUE Feng

(*Christian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By presenting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tholicism, the preaching way of Catholic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the common ground of the Catholic doctrines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fucianism),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he famous Catholic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pursued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the catholicism as well as the effect it exerted. Also it demonstrates the contribution the Catholic missionaries have made in the processes of both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and Chinese culture into the west and their important bridge rol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atholicism; China; culture

(责任编辑 石 涛)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作者: 乐峰, [YUE Feng](#)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基督教研究室, 北京, 100732](#)
刊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 卷(期): 2006, 29(5)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5条)

1. 张小青 [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部分\)](#) 1993
2. 张力, 刘鉴唐 [中国教案史](#) 1987
3. 孙尚扬 [基督教与明末儒学](#) 1994
4. 许明龙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 1993
5. 任延黎 [中国天主教基本知识](#) 1999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修彩波, XIU Cai-bo](#) [方豪的天主教史研究——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例](#) - [莱阳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8(1)

方豪在天主教史研究方面成就颇丰。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为代表,他不仅对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原因、过程及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作了精深的考究,而且还从诸多方面拓展了天主教史的史料来源,为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2. 期刊论文 [郭丽娜, 陈静, Guo Li'na, Chen Jing](#) [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对中国天主教本土化的影响](#) - [宗教学研究](#) 2006, ""(4)

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显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形成是十七世纪罗马为了落实天主教远东本土化政策和力排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而采取的一系列努力行动的结果。虽然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传教经费来源上与法国政府具有一定的资助关系,但就其本质而言,它首先是一个在组织上直属于罗马的传教团体(Association),而非宗教修会(Congrégation),其主要目的是协助传信部建立远东土著教会,因此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过程曾经产生过推动作用。

3. 学位论文 [张振国](#) [拒斥与吸纳: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应对——以明末至鸦片战争为限](#) 2008

天主教在全球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文化移植的过程,而这种文化移植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本土文化。我们知道,天主教入华所要面对的主流群体是中国的广大民众,是中国的普通百姓,因此,天主教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最关键的是要找准中国本土习俗文化的发展脉络,适应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已经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民众文化,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心理特质和思维方式。因此,如何应对中国的民间信仰,是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共分三部分对明末至鸦片战争之前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遭遇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天主教与中国祭祖礼仪之间的纠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祖先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祭祖问题遂成为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问题。显然,在传教士眼中,中国的祭祖仪式属于异教偶像崇拜,即使是利玛窦也已认识到这一点。然而,祭祖在中国社会运转中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使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无异于关闭中国人步入天堂的大门,严峻的现实处境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中国祭祖礼仪的性质。于是,在文化适应策略的思维框架中,利玛窦借用儒家经典中的人文主义精神强化了祭祖礼仪的世俗道德内涵,而故意忽视其中的迷信因素,要求传教士尊重中国民众的祭祀习俗,允许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仪式,从而获得了传教的成功。其后来华的多明我、方济各等托钵修会的传教士,则出于宗教的本能而把中国祭祖礼仪列为应当禁止的迷信范畴,对利玛窦等的做法提出质疑,并把自己对中国礼仪性质的认识上报罗马教廷请求裁决,从而引发了“礼仪之争”。面对托钵修会传教士的质疑及教廷的压力,来华的耶稣会士选择康熙皇帝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特别依据,使“礼仪之争”突破了单纯神学急论的范畴而演变为中国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权利弈,结果导致了中国政府的禁教,天主教在中国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尽管传教士在是否容忍中国信徒祭祀祖先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对于祭拜木主、烧纸钱、向祖先祈福等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间祭祀习俗却态度一致,视为典型的迷信行为而予以系统的文化批判。然而,面对中国信徒在祭祖问题上表现出的执着,即使是视中国祭祖礼仪为迷信行为的托钵修会传教士,也不得不对中国民间的祭祀习俗做出相对宽容的姿态,不仅尽量适应地方的习俗礼仪,而且把天主教的内涵融入民间祭祀礼仪之中,希望信徒能以天主的名义来践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第二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民间信仰的文化批判与征服实践。作为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遭遇,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天主教在华传播过程实际上就是与中国民间信仰争夺信徒的过程。因此,为实现“中华归主”的夙愿,传教士在入华之初即对中国民间信仰展开了文化上的“扫荡”,试图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理论基础。他们一方面集中力量对城隍、关公、观音、灶神等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大众性神灵进行批判,宣扬天主的独尊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民间社会盛行的算命、风水等世俗迷信行为以及各种巫术活动予以批判,指责其对天主权威的僭越。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民间信仰进行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传教士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学说的“卫道士”,以儒家人文主义的标尺对民间信仰加以评判,批判其荒诞与虚伪。尽管传教士对民间信仰的批判入情入理,但其实际功效却并不乐观。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文化水平的低下极大地限制了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影响力,使其难以对中国民众的信仰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知识分子阶层来说,虽然在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宗教意识向来比较淡薄,因此他们对于传教士文化批判的回应主要聚焦于祭祖、祭孔的礼仪方面,而在民间神祇,或世俗迷信问题上并未与传教士形成对话,但这远不足以使其转而改宗天主教,因为,毕竟民间信仰已经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即使是儒家士大夫阶层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这些传统信仰。与此同时,出于对中国民间神祇的先天仇恨,更加之被中国民众对待神灵的那种随意性乃至鄙夷、侮慢的表面现象所蒙蔽,有些传教士在所到之处肆无忌惮地发动“对伪神崇拜的无情战争”。然而,实践证明,传教士及其信徒对民间神祇的这种直接打击,导致他们与民间社会乃至官府的积怨日深,给福音传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征服偶像活动逐渐发生转向,由直接的“暴力”打击转为与民间神祇之间的“法力与灵验”的“和平竞争”,以此收服人心。他们利用中国民众对圣物崇拜的心理,充分发挥圣水、圣像、十字架在归化信徒中的作用,介入民众日常生活,与和尚、道士、巫师斗法,驱魔禳灾以赢得信徒;大肆宣扬天主神迹,以天主的灵验收服民心。不过令传教士尴尬的是,他们为收服人心所采取的举措竟然与民间信仰极为相似,因此,在赢得民众大批归化的表象之下,中国教民原有的信仰心理是否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则难有定论。当然,对于天主教对民间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尤其是摧毁神灵偶像的过激举动,中国民间社会也予以积极回应,他们或制造、传播谣言丑化传教士及天主教,或对传教士及其信徒实施直接的报复行动。第三部分,天主教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因应与吸纳。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天主教要实现“中华归主”的战略目标,本土化是其必然的选择,而本土化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握好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脉络。而对于下层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

是一种生存方式。在布道的过程中，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要想把民间信仰从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剔除是不可想象的，而且鉴于当时传教环境的恶化，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民间信仰作为适应的对象，借鉴民间信仰的生存及传播方式以使福音得以延续。生活在下层的民众，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只有求助于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这种“信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精神追求，而只是出于低层次的简单直接的利益需求。中国民间信仰的这种普遍的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会影响到下层民众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对下层民众来说，能够打动他们的是新宗教的灵验性，而不是那些玄妙高深的教理。针对上层民众这种传统的崇拜心理，一些传教士尽量将天主教的信仰同中国的民间风俗结合起来，以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将天主教的信仰融入他们的生活，以上帝的名义施行各种善事，满足民众的一些现实需求，并以自身高尚的德行感化民众，赢得人们的好感，同时迎合民众的传统心理，通过一些看似巫术的“神功”（其中有一些科学知识的运用）展现天主教宗教仪式的有效性来吸引民众，使他们逐步接受天主教的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清中叶天主教依靠众多散居各地的信仰团体的自发性习教，度过了官方禁教的严厉时期，成功避免了天主教在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命运，使其在中国顽强地生存下来，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孕育出带有中国民间传统色彩的天主教群体。这个群体在清中叶禁教时期一直保存、延续着天主教信仰，到晚清教禁开放后，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基础。当然，由于教会统一组织与管理的缺失，这一时期天主教的本土化没有形成传统，使自身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应有的距离难以把握，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失，使天主教在教义、礼仪方面呈现出一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严重民间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民信仰的波动；而且，天主教的下层路线使其处于一种自我封闭状态，导致世人对天主教的认识越来越模糊，为近代反教谣言的泛滥埋下伏笔，使之成为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

4. 期刊论文 [郭丽娜, GUO Li-na 巴黎外方传教会与天主教的中国本土化历程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22(1)

巴黎外方传教会是17世纪在巴黎形成的一个传教团体。从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材料分析,巴黎外方传教会直接听命于罗马教廷,肩负协助教廷传信部协调葡萄牙保教权和建立远东土著教会的使命赶赴远东。巴黎外方传教会入华对天主教中国本土化产生过正面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

5. 期刊论文 [周萍萍 中国天主教历史的浓缩与定格——读《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7(5)

磨盘山天主教社区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最早的由教会管理的地方。经过三百年的积淀,这里仍然集中居住着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通过《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一书,可以发现,一个社区的历史几乎是历史的浓缩;小地方的个案分析在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有看不可替代的作用。

6. 学位论文 [刘建平 红旗下的十字架——新中国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演变及其影响\(1949—1955\)](#) 2008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首要关怀无疑是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安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作为国内与西方世界联系最为紧密,且意识形态与无神论政党完全对立的团体,自然也就成为新政权必须进行改造以实现对控制的重要领域。然而,由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群众性、国际性以及苏联公开反宗教的失败教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断然宣布两教为敌对势力,进行公开打击,而是允许信徒在“信仰自由”原则下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借用中国教会历史上已经发展起来的“三自”的血统形式,全力引导和推动了旨在彻底切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联系的革新运动。通过此举,中共新政权不但实现了割断两教与西方世界联系以巩固新生政权的自标,而且完成了对中国教会的初步改造,最终基本上控制了这一被认为是影响其政权安危的特殊领域。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则在这种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萎缩和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共包括七部分,即绪论、五章和结论。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章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切入点和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资料情况以及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等问题。

第一章从源头入手,分析中国传统的反教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宗教观以及苏联宗教政策的前车之鉴等诸多因素是如何作用于中国共产党的。

第二章从中国内外政策与教会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角度切入,阐述新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的形成过程,并重点考察新政权为彻底割断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发起两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第三章着重论述中共新政权对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全面清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后,紧迫的危机感促使新政权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策日趋激进。在这一形势下,新政权开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关系,来彻底杜绝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从中国内部搞破坏的可能。控诉教会罪恶、驱逐外国籍传教士、切断源自西方各国的津贴以及接管教会所属机构等举措,无不体现出新政权的这一目的。

第四章重点考察了新政权为进一步“纯洁”教会而进行的几场重大斗争。在政府的全力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虽有相当的进展,但不光是基督教内,还是天主教内,都有对抗革新的势力存在。为进一步推动“三自”革新运动的发展,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新政权在两教内发起了进一步“纯洁”教会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通过此举,两教内公开对抗革新的势力被彻底打跨。第五章分析了新中国宗教政策对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影响。新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权力和影响深深地植入了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使得原本带有极为浓厚的西方成份和亲西方色彩的基督教、天主教彻底改变了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中国教会的阵地不仅大为缩小,而且其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作结,指出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极其复杂,内部充满了张力。首先,建国初期新政权基督教、天主教政策的最大诉求是通过“反帝”的形式来彻底切断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联系,并在这有着特定含义的“反帝”过程中借用“三自”的血统形式来改造教会,以使中国教会完全脱离西方世界而置于新政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次,虽然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中共新政权从传统的角度出发,仍允许信徒享有“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中共新政权又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严格控制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发展,即所谓“缩小(两教)市场”、“限制(两教)发展”的政策。这就使得新政权的基督教、天主教政策变得异常复杂。再次,建国初期新政权的宗教政策不管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中国教会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共来说,新政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政策不仅彻底切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且在“三自”中完成了对两教的初步改造和控制。然而,若从中国教会的角度视之,情况就完全两样了。

7. 期刊论文 [刘丽敏, LIU Li-min 中西之“神”再辨——以中国民间信仰与天主教为例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5(3)

“神”是一个宗教信仰体系赖以建构的核心概念。关于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的异同,学界已经做出了广泛且深入的探讨,但总体看来似有一个误区,即缺乏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独立的考察。本文以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与天主教中的“神”(天主)为例,对中西宗教文化中“神”的概念、神的形象以及信徒对于神的理解的差异作一个系统的探讨。

8. 期刊论文 [荆世杰, JIN Shi-jie 50年来中国天主教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 23(1)

建国后中国天主教研究可以分成几个时期,1949—1978年为第一时期,研究受意识形态左右;1978年之后从教案研究开始学术性逐渐增强,9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空前,各阶段研究呈现出不同的侧重和范式,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天主教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学术转型的挑战和跨学科整合的任务。

9. 学位论文 [孟凡胜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研究](#) 2009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采取灵活的传教策略,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结交上层士大夫,并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终于使天主教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但利玛窦去世后,他的继任者坚持按天主教的教义进行传教,导致天主教遭受中国传统势力的围攻,最终在“南京教案”发生后被禁止。清代中期之后,由于顺治皇帝的优容和保护,天主教得以逐渐恢复,但“礼仪之争”又使得天主教遭到全面禁止,从此走上非法的道路。天主教的衰落具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天主教内部各修会的分裂等等。天主教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起伏跌宕,但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传入了中国,并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了西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传教士们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史料,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这段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对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本文主要从四大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传教士东来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迫切需要到海外传教,以扩大天主教在世界的影响力。而葡萄牙等国的殖民活动,也为传教士的传教提供了一定的条件,这一时期,葡萄牙已经占领了澳门,为传教士进入中国提供了中转站。在中国国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这些都使得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难度加大。

第二章主要讲述了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明末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依托澳门为中转站,以灵活的传教

策略一度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站稳脚跟，但是“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得天主教走向衰落。清朝初年由于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获得了顺治和康熙的认可，得以迅速发展，但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干预，天主教的传教策略有所改变，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明末和清初的传教方法、传教对象都有所不同，本章也展开了论述。〈br〉

第三章主要从明末清初天主教衰落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原因、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传教士内部的分裂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四个方面分析了天主教衰落的原因。这其中传教士内部的分裂是主要原因，传教士们的传教策略各有不同，各修会之间又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使得传教士的凝聚力大大减弱，因而面对中国传统势力的攻击时缺乏应对能力。〈br〉

第四章主要讲述了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了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入了西方，成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载体。

10. 会议论文 聂向东 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从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等工程设计谈起 2007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面临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我们将持何种态度？每个人都需要归属感和认同感。当人们面对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新文化之间的价值取舍时，难免心怀忐忑。一方面，人们渴望吸收和融入新的先进文化；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自己文化传统和根基。只有前者可能会感到背叛了自己的文化和家园，只有后者则会感到被社会文化排斥在外。这种现象加剧了文化的冲突。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的命运如何？和谐社会呼唤文化和谐。中国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基础。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是中国天主教最大的神学院，是一个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和谐相处的典型。笔者近年来设计的几个其他工程，也可以作为实例来分析。本文通过分析本人主持设计的若干建筑工程（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中国驻欧洲某国大使馆等），研究从社会舆论到业主意图直至建筑师追求中所表现出来的当代建筑业对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一些探寻与思索。

引证文献(1条)

1. 朱大锋 “利玛窦规矩”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期刊论文]-兰台世界 2009(7)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xdxxb-zxsh20060500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1ebc383-fd4d-4642-af72-9e4d006d66c9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